

屡被删改的油画《开国大典》

吴继金

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它是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它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然而《开国大典》命运却异常坎坷。它数次被迫修改，其作者董希文也因而饱受磨难。

受命创作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建党节日，中央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建党画展。中央美术学院受委托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

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董希文曾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画作多次得到徐悲鸿等众多著名画家的好评。他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

接到任务后，董希文从开国大典摄影、图片资料里发现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象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选择画面构图。

他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在观众面前。为了开阔视野，他把按一般透视规律应该看到的一根廊柱抽去，使画面顿觉敞亮起来，展现出一个真正的泱泱大国的气象。

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迎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们胸前佩戴着代表的红签，脸上呈现出聆听着《公告》的激动神情。广场上红旗如林，绚丽多彩，远处升起五星红旗，标志着我们古老民族的新生。

广泛影响

《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小学课本。

《开国大典》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一天，周扬等领导带董希文去中南海汇报，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当他们一起看到《开国大典》时，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很兴奋。毛泽东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开国大典》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徐悲鸿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改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 and 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

多次修改

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画中人物的命运就决定了此画的命运，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开国大典》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这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其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名扬全国，也因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政治磨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才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此后又被开除出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

澜、高岗。因为高岗站在前排边上，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因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很遗憾，等到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此画，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修改。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开国大典》历经风风雨雨的磨难，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显示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时期被扭曲的艺术和政治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

摘自《文史春秋》

袁世凯导演的政治婚姻

王 凯

联姻一直是政治人物笼络对手、羁縻部属的惯用手法。袁世凯就是一位这方面的高手。

1900年，段祺瑞原配病故，袁世凯便把自己的养女张佩荫许给了段祺瑞。

民国成立后，段祺瑞留守中樞掌管军务，而冯国璋则率部南下镇压“二次革命”。1913年底，冯国璋攻陷南京后被任命为江苏都督，成为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袁世凯最担心手握重兵的冯国璋尾大不掉，便竭尽笼络之能事，恰好冯的原配去世，袁大总统便将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女家庭教师周道

如介绍给冯国璋。一位是满腹经纶的美貌才女，一位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此事自然一拍即合。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有了帝制自为的居心。为了获得副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他又玩起了“和亲”的老把戏，提出与黎家换亲，后黎之女黎绍芳嫁袁的九子袁克久，以袁之女嫁黎元洪长子黎绍基。黎元洪夫人对此极不情愿，后经众人一再劝解，黎夫人虽勉强同意女儿的婚事，但却坚决不同意袁世凯女儿嫁进黎家：“袁世凯的女儿要做我的媳妇，我这个婆婆吃不消。”

黎绍芳和袁克久订婚时年龄很

摘自《法制日报》

谁拯救了科隆大教堂

徐立新

闻名于世的德国科隆大教堂，是迄今为止人类建筑史上建造时间最长的一座“哥特式”建筑物，共花了600年时间才竣工，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尖塔教堂，高约150米，相当于一座50层的大厦。

大教堂内部四壁上，镶嵌有一万多块颜色各异的玻璃壁画，描绘着完整的圣经故事，在灯光的照耀下，金光闪烁，绚丽多彩。

今天，科隆大教堂已经成为德国的一个著名景点。然而，整座科隆大教堂经历二战能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中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科隆大教堂半建半停，就是许多流浪汉寄宿的地方。建成后，教堂让流浪汉们寄宿在地下甬道里，虽然这里阴暗无比，条件很差，但流浪汉们却已非常满足了，因为这里是唯一肯收留他们的地方。这些流浪汉中不少是残疾人。

二战后期，盟军决定轰炸德国西线最后的据点科隆，此消息一出，许多科隆人纷纷外逃，科隆大教堂也一下子变得空空如也。

所有的人都清楚，盟军肯定要

炸掉大教堂的，因为它是科隆的最高建筑，炸掉它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时，寄宿在大教堂里的流浪汉中，有一位老者站了出来。他说，过去大教堂给了我们无限庇护，今天，虽然我们无力保护它不被炸毁，但我们能做的是将大教堂里的玻璃壁画全拆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人。

这位老者的提议得到所有流浪汉的支持。在他的带领下，流浪汉们开始拆卸玻璃壁画。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一万多块壁画，既要快速拆下又要保证不损坏。

由于大教堂里的梯子都被锁了起来，流浪汉们只得得到外面去借梯子甚至是偷。

在梯子的帮助下，体格健全的人负责拆壁画，其他肢体有残缺的人则负责将拆下来的壁画偷偷运到地下甬道里藏好。

流浪汉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就在快要拆到最高层时，盟军的轰炸机呼啸而至了，巨大的轰鸣响声表明他们马上就要炸了，对于这群流浪汉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撤离。

然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没有

一个人逃离，他们仍按部就班地拆卸着壁画。最上层的一圈壁画需要从外面拆，好几个流浪汉仅在一根绳子的拉扯下，全身悬在塔的外面，把自己当成了“蜘蛛人”！而轰炸的飞机就近在咫尺！他们随时都可能丧命。

没有害怕，没有退缩，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盟军轰炸机上的军人。突然，领头的轰炸机改变了方向，上了膛的炮弹并没有朝大教堂的主体发射，而只是象征性地朝它的周围射了過去，接着便呼啸而过，随后的几架轰炸机也跟着做出了类似的动作，“敷衍了事”地飞走了。

此后几天，整个科隆几乎被盟军的炮火夷为平地，唯有科隆大教堂依然耸立在原地。很多人认为，那是上帝在发挥作用，冥冥中庇护了科隆大教堂。

2008年5月，一封解密的二战盟军轰炸科隆的飞行记录揭开了悬疑——一个代号为MX78的军官这样写道：“当我决定下令改变主意，放过大教堂的那刻起，我就知道我会因此而受到处罚，但是，当你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将自己悬在高高的塔尖之外，不顾生死地抢救壁画时，相信你也会跟我做出同样的决定。”

上帝也有保护不了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它需要那些懂得感恩的人来庇护。

摘自《羊城晚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名著与人生

何大章

我初次在《世界文学》杂志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十分吃惊：一个男人早晨醒来，怎么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我在靠近开水房的一棵皂荚树下，和一个熟悉外国文学的同学谈到《变形记》。他头发长长的，神情倦怠，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嗤之以鼻。看到我的惊惧，他宽容地笑了笑，说：“是的，卡夫卡就是这样。”这是我听到的对卡夫卡最早的评论。印象深刻，却又一片茫然。那是1979年春天，我们都不足17岁，是成都24中高二的学生。读小说，就像吃饭喝水，缺一天都难受。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我还兴奋地读完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1979年秋，我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念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却与小说无关。我的理想是做一考古学家，然而，进去了才晓得，我选择的系是对的，而专业却错了，考古学家只出在考古学专业。

我有点沮丧。常听课走神，还借来许多小说，边听、边读。川大图书馆藏书甚巨，但那是个全民读书的年代，有好书大家抢着看，譬如《三个火枪手》，为了书畅其流，只能在馆内读。于是，我上课偷偷啃巴尔扎克，下课就去图书馆排队看大仲马。大仲马和巴尔扎克都能写，一辈子写了一大堆，大仲马的影响，有点像稍晚风

行的金庸，不仅好看，还可拿来吹牛。而巴尔扎克的书厚实如砖，说啃是合适的。我常感慨：“生子当如大地的甲虫（或者巴尔扎）！”但和另一部小说的相遇，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红与黑》是极少数必须在馆内阅读的“严肃小说”之一，可见借阅率之高，也可以想见它让人读得多么心痒痒。我还记得，它是繁体字、竖排版的，罗玉君翻译，封面红色，绘有一个舞会的场面，线条是忧郁的黑色。那些天，我吃饭、睡觉、上课都在牵挂它。终于读完全书，才发觉从此就没法摆脱它。它那么有激情，又那么神秘和伤感，相比之下，大仲马仿佛是聪明的说书人，而巴尔扎克则像于连那个做木匠的爹，有的是气力和狼劲，少的是细腻与优雅。我修正了我的想法：司汤达一生只有两部完整长篇，但把大仲马和巴尔扎克所有小说加起来，也不及一部《红与黑》够意思。

这时候，电视里要播电影《红与黑》。中文系把唯一的一台彩电抱出来，放在文史楼侧门让大家共享。前一天就有同学用凳子、椅子、砖头抢占位子，放映的时候，蹲着、坐着、站着、趴着的都有，还有人在为一个立锥之地而互敬拳头！观众起码有200多人，而电视机最多20吋。望得眼

睛发酸，屏幕上第一个露脸的却不是于连，而是赵忠祥，他微笑着，以后来解说《动物世界》的好听嗓音，向我们解读《红与黑》。稿子当然是专家写的，调子自然是“要批判地吸收”。片子因为长，就被锯成两半，放了两个晚上，简直吊足胃口。

我课后除了独泡图书馆，就是看电影。电影大多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有时候是因为小说而去看电影，有时候则是看了电影才去读小说。也会有例外，看了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后，我就不想再读小说原著了。看了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再看电影，感慨梅里美幸亏死得早，不然他会被再一次气死。还到稍远的望江川灯光剧场的旧场子里看过电影《子夜》，灯光很暗，看得眼痛，同学们大呼：“亮点！”一个女检票员哼了一哼，轻蔑道：“亮了还是子夜吗！”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我觉得她有点像演王熙凤的邓婕。

我后来成了一个小说家。因为写小说，多年后我在川师中文系课到一份教职。前些天，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放了《红与黑》的影碟，正是钱拉·菲力普主演的老版。放映前，我讲了我们当初为它看得挤破头的经历，学生们无不摩拳擦掌。但放映时，却没出现群情激动的场面，他们甚至有一点走神。当放映到于连犹豫不定是否要硬闯德·瑞利夫人的卧室时——我们当初是屏住呼吸看的，而今学生却看笑了，笑他婆婆妈妈的！我也暗笑了，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快30年。

摘自《新华日报》

老人的孩子说，他母亲放下电话不久，就死了——脑癌！战战兢兢地把消息告诉母亲。80多岁的老母亲居然只叹口气：“多少年来电话，接到，就知道不妙。她真是老妹妹了，从小在一块儿，几十年不见临死还惦着我。只是，老朋友都走了，等我走，又惦着谁呢？”母亲转过身，坐在床脚，呜呜地哭了。

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钱学森、杨振宁全是他的学生，他开中国物理系先河，终生未婚。把自己交给了物理，交给了学生。在“文革”时期，被说成特务，为了不牵连学生，在清华遇到学生时，他假装不认识。有学生上前打招呼，他摆着手说，不要来，不要来。那阵他背已驼发已白，每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床上，放着整摞的物理书。而他睡觉的地方，只是一张椅子。

摘自《青年文摘》

心灵深处有最爱……

刘 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世界。一位成功人士对我说：“我一生做事，不欠任何人的。对父母，我尽孝；对朋友，我尽义；对妻子，我尽责。如果有什么亏欠，我只亏欠了一个人——我中学时的女朋友。她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叫她去堕胎，还要她自己出钱。我那时好穷啊，拿不出钱。问题是我不但穷，而且没种，我居然不敢陪她去医院。”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到今天，我都记得她堕胎之后苍白的脸，她从没怨过我，我却愈老愈怨自己……”他找了她许多年，借朋友的名字登报寻

人多次，都杳无音信。

怪不得日本有个新兴行业，为顾客找寻初恋情人。据说许多恋人，隔了六七年不见，见面时相拥而泣，发现对方仍是自己的最爱。

有一天，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声音遥远而微弱，居然是母亲十多年不见的老友。母亲一惊，匆忙由床上爬起来，竟忘了戴助听器，有一句没一句地嘟哝呀呀。我把电话抢过来，说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再转达。电话那头的老人，语气十分平静：“就告诉你她，我很想她。”

过了些时日，接到南美的来信，

唐诗中的石榴裙

葛忠雨

人们常将男子钟情于某女子称之为“拜倒在石榴裙下”。可是石榴裙又是个什么款式呢？

唐朝时期，石榴裙是极受年轻女子青睐的一款服饰。如唐人小说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穿这样的裙子。既然名为石榴裙，那么颜色自然如石榴般鲜红。穿着石榴裙的女子被这红色一衬，更显得艳丽动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写那位琵琶女的惊人色艺时这样写道：“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血色罗裙”指的就是石榴裙，用血色来形容裙子之红，鲜艳可见一斑。

而专为石榴裙所作的诗词歌赋，亦是不少。南北朝诗人何思微在其《南苑逢美人》中写过这样两句：“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用石榴来暗喻心中的美人。元代的刘

铤在《乌夜啼》中用石榴直指女子的裙裾：“垂杨影里残，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暮雨急，晓霞湿，绿如玲珑，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明代时石榴裙的说法固定了下来，蒋一葵的《燕京五月歌》将石榴裙称为红裙：“石榴花发街欲焚，蜂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唐诗中对石榴裙的描写更多，如李白诗“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甚至一代女皇武则天也赋诗“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唐代妇女对裙子钟爱有加，除了石榴裙，还有很多别致的款式，而裙子在唐代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初时，裙子窄而瘦长，故有“慢束罗裙半露胸”的诗句。盛唐时，裙子制作得精美华丽，主要式样有

间裙、百鸟裙、花笼裙。间裙，就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材料互相间隔排列做成的裙子，每个间隔叫做“破”，有“六破”“七破”“十二破”之分，颜色有红绿、红黄、黄白等等。百鸟裙，顾名思义，就是将多种飞禽的羽毛捻成线织成的裙子。百鸟裙做工考究，立体感极强，可谓“正视为一色，旁视为一色，目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穿上之后“百鸟之状皆见”。花笼裙是用轻软细薄而又半透明的“单丝罗”织绣，裙子上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绣出花鸟等图案。除了这些样式，还有百叠裙、画裙等等诸多款式。

石榴裙流传的时间很久远，明代唐寅在《梅妃嗅香》一诗中写有“梅花香满石榴裙”。诗中写的虽然是唐朝的事，但可以看出在明朝时期，《石榴裙》里的大段描写，可相印证。也许正是因为石榴裙流传久远，所以俗语中说男人被女子的美貌所征服，称之为“拜倒在石榴裙下”。

摘自《中国文化报》

花，听杜鹃叫。”这是黄永玉同他表叔沈从文聊天时说的话。

黄永玉问表叔：这样是不是有点小贵大做？沈从文答：“懂了就懂了。”

是啊，懂了就懂了。

这世间，必有一种懂得是精神，穿越灵魂，幽幽而来。总有那个明白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的惆怅的人，总有发个信儿就剌那间说慈悲的人，因为，他的精神强度恰巧与你一个线上，不远，不近，你说，他懂，他说，你懂。

即使没有那个一起来看杏花的人，还是饱满的。因为内心是强大的，是蓬勃的，是生生不息，是杏花春雨里最美的笛声，是一个人的自斟自饮。是徐悲鸿说的那句：“我就要一意孤行。”

那些有精神强度的人，是金，藏于内心。不显露，但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会闪现出非常动人的光芒。

即使放在最孤寂的地方，他不凋落，放在最热闹的地方，它不张扬。它用精神支撑着内心，那个花园里，妖妖地开着一朵又一朵世间难寻的花，如果你进得去，那么你看得到。

摘自《长城》

精神强度

雪小禅

我喜欢精神强度这个词。

一个作家说，三十岁以下的爱情不靠谱。因为完全是利比多分泌太多的结果。三十岁以上，意识形态完全成熟了，步入了一种精神领域，再喜欢一个人，精神的成分要站得住脚。

即使和爱情不沾边，有精神强度的人，不会轻易被打倒。虽然有时候他很脆弱，但这脆弱，其实是艺术里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支架，犹如寂寞花园里一朵绚丽的花，安静地开，安静地谢。

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钱学森、杨振宁全是他的学生，他开中国物理系先河，终生未婚。把自己交给了物理，交给了学生。在“文革”时期，被说成特务，为了不牵连学生，在清华遇到学生时，他假装不认识。有学生上前打招呼，他摆着手说，不要来，不要来。那阵他背已驼发已白，每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床上，放着整摞的物理书。而他睡觉的地方，只是一张椅子。

事后有人问过他，觉得寂寞吗孤独吗绝望吗？他答，我有物理，有书，有天空，有深邃的精神。如果不是精神世界的强度，或许他早就和一些大师一样选择自杀、投湖或悬梁。他倔强地活在自己芬芳世界里，一直到生命最后。

看杜拉斯传，惦记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强度——她的一生，总在打倒别人，从来没有被别人打倒过。即使爱情。她用她的文字打倒读者，用她的爱情打倒男人。在离别时，她不哭男人哭，在爱着时，她得意地说，你多幸运呀，你爱上我，你爱上这么著名的一个作家！

她一点也不卑微，一点也不示弱。不，一点也不！

我在她的强度里感觉到了无限的软弱。她没有性别，她是杜拉斯。她说，我渴望堕落。

而大师黄永玉，一直在用画来表达他的精神强度。“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远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否